

试论尊经书院与四川士林风气的变化

何一民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人杰地灵，自远古的巴蜀以来，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代代不乏人才。然而有清以来，四川却学术衰微，人才凋敝，士林风气败坏。直到19世纪70—80年代，四川的士林风气才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蜀学得到振兴，人才也不断地涌现。考其变化发生的原因与成都尊经书院的建立有密切的关系。故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以就教方家。

一、清代中前期四川的士林风气

清初以降，四川学术衰微，人才凋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战争兵燹的影响

明末清初，四川在连续数十年内遭到过四次大劫难。1.明末奢崇明等叛乱。2.张献忠大西军进川。3.残明军队、地方恶势力和清军的轮番破坏。4.吴三桂叛乱。四川经此四次战争破坏，完全成为残破之地，“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之中”^①。美丽富饶的成都平原“尸骸遍地，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麻桑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②“城廓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邻枯木茂草，唯看白骨崇山。”^③“成都城中绝人迹者十五六年，惟见草木充塞，麋鹿纵横，凡市廛间巷官民居址皆不可复识，诸大吏分赴城楼”^④。四川社会遭到空前未有的大破坏，田园荒芜、经济残破，人口锐减，文化也随之衰微，大多数书院、典籍、文物皆化为灰烬。

（二）移民的影响

面对四川的残破景象，清王朝感到最重要的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但在四川人口锐减的情况下，要达此目的，非大规模的移民不可。于是清廷“命招他省民入川开垦丈增田亩”。从顺治末年到嘉庆中期的百余年间，湖北、湖南、陕西、贵州、江西、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浙江等省均有大批的民众陆续迁徙入川。移民进入四川后，最迫切的是需要解决衣食住行等生存的起码物质问题，故集中全力开发经济。对他们来说，修养生息，尚且不遑，何有余力来复兴文教。另外，迁川移民数量虽多，但素质却很差，“多系无业穷民”^⑤。大多数是没

有文化的文盲。贫穷和艰苦的环境使他们缺乏教育，也使他们难以产生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追求。清初前几代迁川移民的素质严重地影响着后代人。清中前期不仅是一般人的子弟很少读书，就是一些大粮户的子弟也多目不识丁。

（三）清代四川教育体制的影响

明末清初，四川的书院大多毁废，“先师庙者惟茂林丰草”^⑥。“学宫则遗址榛莽，民圃其中。”^⑦康熙年间，四川各地政府始逐渐重建文庙和县、府学，置学官二人主持该地区的教育。

清初，学宫为新录生员学习之所，由学官负责考核，每年将生员的课业、品行报告学政。但大多数学官都疏于管理，实际在学者极少，后来仅只有月课、季考两种考试。学官失去教育功能，主要对士子起着社会控制的作用，督促和鼓励生员参加由学政主持的岁试和科试。嘉庆以后，因待遇微薄，学官失职，学宫逐渐废弛。这时，具有中等和初等教育功能的机构主要有书院、私塾和义学、社学等。这些书院、私塾、义学、社学都受到清王朝的教育政策的控制和支配，并为其统治服务，教学与灌输封建的礼教、纲常，学习的内容主要是科举八股时文和儒家经典著作。清代四川的教育制度不再培养士人的独创精神，只鼓励他们对权威的崇拜，只教会士人学会阅读，专心攻读儒家的经典，从而使他们的思想转向过去，成为古礼成规、圣贤经典的俯首贴耳的奴隶，并为应付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挤进仕途而耗费尽最富创造力的青春年华。

在以上几种因素的交叉作用下，清代中前期，四川士林风气败坏，蜀学衰微。其主要表现有四：

（1）热衷科举，不重读书，不事学问

热衷科举，是有清以来整个中国士大夫阶层的通病，而四川士人尤甚。正如前文所述，清初以来，四川文化出现中断，而移民中士人较少，尤缺乏中高层次的士大夫。因而四川士人多碌碌无为。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而追求功名，当时追求功名的捷径就是通过科举八股考试。故川省士人“自制艺取士以来，群好帖括，经史百家，每束高阁。”^⑧各书院均以攻时文、习考课为主，使教育机关沦为科举预备场。士人们在其引导之下“用之以八股、试帖、措摺，俾之穷年矻矻，不暇为经世之学。”^⑨张之洞称：“近今风气，年幼方学，五经未毕，即强令为时文，其胸中常无千许字，何论文辞，更何论义理哉？常年有开笔十年，而文理仍未明顺者。”^⑩由此可见，当时川中士人的知识是何等的贫乏，学识是何等的浅陋。

锦江书院是清代中前期四川的最高学府，是“全川书院之首”，“为通省作育人才之所”^⑪。然而，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之下，其课程仍以八股时文为主，“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不脱考课与时学的巢臼。”^⑫锦江书院在乾隆以后，管理松懈，各种条规废弛不行。书院学生学风浮华，抱残守阙，弄虚作假，不仅不学传统的文化知识，而且连时文八股也不愿下功夫，“日多在外游荡，夜深方归，甚至招留友朋，视书院作旅寓。”^⑬锦江书院是川省学界的楷模，习则相踵，对各州县士人影响甚巨。到19世纪后期，四川已是“正学不讲久矣，道统茫茫，一线几坠。”“学校以利禄相趋骛，缙绅以文酒

为旷达。齷齪之辈，墨守故封；华藻之徒，甚至害义。”^⑭书院学府如此，士人学子如此，茫茫巴蜀之地，哪有饱学之士和学术之风！

（2）科场作弊兴盛

清代科举考试的程序较复杂，一个士人要经过县试、乡试、会试、殿试等若干场考试，才能完成全过程，从而进入仕途，上升为官僚。“由是士也，髫龄入学，皓首穷经，夸命运、祖宗、风水之灵，饶房师、主司、知音之幸，百折不磨，而得一第。”^⑮且有连试不中，至死也为童生者。功名利禄的诱惑和激烈的竞争，使许多士子在科举考试时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弄虚作假。四川的士人由于在读书的过程中，学风不正，浮华虚骄，惰驰不学，胸无点墨，故为了博取功名，更是费尽心思，做假舞弊。同光年间，四川学政张之洞奏称：“考试作弊，各省皆有，然未有如川省今日之盛者，弊窦日巧，盘结日深，几并为一局，牢不可破，士子以舞弊为常谈。”^⑯“川省积弊录遗，一场大率代替，十无一真”，“通省群县，相习成风”^⑰。各地官吏或为腐蚀收买，或与作弊有牵连，或不敢得罪地方势力，故多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由此助长了此风的滋生和蔓延。由于作弊成功的例子越来越多，各地士子再也不愿将精力放在学习上，而群起效尤，纷踏故辙。

（3）喜滋事，好诉讼，醉心请仙扶乩

川省士人胸无大志，学无长进，性格多浮躁，喜欢生事闹事，有的形同徒棍威福乡梓。士人中的移民后裔，更是无所顾忌，骚扰社会，“学校、门衙不能约束”^⑱。许多士人不务正业，或“横悍貌法”，或热衷诉讼。张之洞称：“川省最多讼棍，而讼棍多系贡监文武诸生”^⑲。“川省士林，讼风甚炽，琐琐凌告，已为非礼。甚者牟利其间，为辅为坐，最玷儒冠，或有名无所为，负气忿争，株连纠结，尤为无谓”^⑳。也有许多士人热衷于旁门左道，醉心于请仙扶乩、神怪佛道之中。层次低一些的就在市井诱惑世人，蒙蔽百姓。层次高一些的就著书撰文，宣扬邪说，“将理学、释老、方技合而为一”，“或将阴鹭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揉牵引，忽言易道，忽言神灵果极，忽言丹鼎符箓，鄙俚拉杂，有如病狂”^㉑。川省士人虽非悉数如此，但害群之马为数不少。这不仅有损整个士林的形象，而且反映出当时川省士林的素质较差这一实际状况。

（4）保守、偏狭、不关心时事

四川地处西南，山多水湍，交通不便，与外省联系困难，信息输入缓慢。往往是江南妇孺咸知之事，蜀士尚蚩蚩然。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虽然是养成清代四川士人保守、偏狭的心理的客观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四川士流庞杂，腐劣顽陋者众，关心时事者寡。士林“风气不得开，又由五方杂处，无一线文献，汉、唐、宋、明之踪迹渺不可追，本朝士夫道德经济文章，又不足以薰炙而使之奋，近今人才，中外咸以川省为殿。”^㉒川省士人在主观上对新思想、新事物多持顽固抵制、坚决反对的态度。无论是清朝统治者血腥屠杀人民，还是外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他们都毫不在意，仍飘飘然踏着悠闲的步子参加科举考试，以取青紫。他们不关心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衰，除了自己的功名利禄、科举仕途之外，其他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无关痛痒。愚昧、麻木、偏狭、无知、乏术成为清代中前期四

川士林的特点。由于士林风气败坏，士大夫阶层深深堕落。“莘莘济济，鱼鱼杂杂，衣冠俎豆，充牣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愤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败死人之不若。”

“名士者流，用其一团和气、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声音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之大本领，钻营奔竞，无所不至。……日演其种种之活剧，奔走不遑。”^①此段史料对川省士林做了一个非常生动形象准确的勾画。

二、尊经书院的建立

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官僚，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农民革命战争的双重打击之下，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四川知识界的状况引起了他们的忧虑和不安。四川学政张之洞感到“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②。欲治川省之士则应先从改革积弊，整顿学风始。为此，张之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剔除科场积弊外，主要创办了尊经书院。

创办尊经书院最初是由洋务派官僚、工部侍郎薛焕提出建议，“借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匭于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③这一建议引起张之洞的重视和兴趣。他鉴于“省城旧有锦江书院，造就不广，与督部堂吴勤公商建尊经书院。”^④并奏请朝廷批准，筹集款项，择地兴工。1875年（光绪元年）春，尊经书院在成都文庙街西侧石犀寺旧址建成。

尊经书院为通省性书院，名义上与锦江书院并列为全省最高学府，但实际地位超过了锦江书院，成为19世纪后期四川的教育中心和传播文化信息、培养人才的中心。尊经书院首批招生的人，是从全川百余州县的3万余名生员中“按学问人品高下，择优录取”。此后，每逢岁科两考从各府县的一二名秀才中调取俊秀者入院学习。尊经书院成为四川士子荟萃之地。

尊经书院的第一任山长为薛焕。薛焕初聘湖南学者王闿运来院主讲未成，继聘江苏嘉定人钱徐山、海宁人钱铁江二人为主讲。尊经书院主其事者实为张之洞。张之洞是近代新式教育的热心倡导者，亦是清季中国新教育制度的奠基人。他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办好书院，教育学生，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他指出：“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⑤因此，他希望把尊经书院办成一个模范书院，“分府拔尤，各郡皆与，视其学大小，人多少，以为等，延师购书，分业程课，学成而归，各以倡导其乡里后进，展转流衍再传。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才。”^⑥从而整肃学风，化民成俗，把全川的士人都纳入到儒家文化的正统轨道上，以达治理川民，维护清朝统治的目的。因此，张之洞一反锦江书院等旧式书院的传统办学方针，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加以改革，使尊经书院与其他书院相比有了较大的区别。

（一）学习内容不同

四川旧式书院的学生“以儒薄相事，其日夕啾啾者，无过时文帖括。”

尊经书院的学生则以研习儒家的经典文献为主。书院严禁学生学习时文帖括。张之洞以为，一般书院为应付科举考试，只习时文，不读经史，根底浅薄，结果时文也做不好。故主

张尊经书院的学生应从根本上入手。他认为：“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①，因而应以攻读经史为主。他要求学生经学方面要先熟读《学海堂经解》，小学方面则先研习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史学方面先读《史记》、《汉书》、《三国志》，同时阅读《四库全书纲目提要》，以简就繁，掌握学术动态和各家各派的源流得失。此外，于“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皆学也”^②。张之洞还拟在尊经书院中设立天文、地理、格致、算学等课程，后因蜀中风气未开，师资缺乏，经费困难，反对者多，而“不能办也”^③。

为了指导尊经书院的学生和四川各地士子读书，张之洞还先后写了《书目答问》和《辘轳语》两书。《书目答问》是为尊经书院的学生所开的阅读书目，书中列举了四部图籍二千余种，为初学者指明了为学读书的门径。书中还附有《国朝著述诸家姓名录》，展示了清人学术之流派。《辘轳语》记录了张之洞在四川各州县按试时各地生员所写的赏罚教戒之语，并就读书学习等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经验体会。此两书对川省士子的士习得失、文章利病、学行文艺都很有裨益。张之洞对尊经书院的发展确实做了一些难能可贵的贡献。

由于学习的内容不同，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大大提高。尊经书院成了当时四川学子追求新知，钻研学问的向往之地，对渴知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二）学风不同

旧式书院的学风空疏虚浮，华而不实，学生死记硬背，头脑僵化保守。

尊经书院的学风崇实去浮，沉静好学，学生志趣广泛，能有独立见解。

尊经书院创建之初，就制定了18条章程，规定学生们要严格按照这些章程“定志”、“择术”、“通经”、“务本”、“知要”、“定课”、“用心”、“笃信”、“息争”、“尊师”、“慎习”、“善诱”、“无过”、“约束”、“惜书”、“释疑”等。这些规定为尊经书院形成新学风奠定了基础。

尊经书院要求学生认真读书，一切学术不可偏废。张之洞认为“若一入院有抱一而自足，是此而非彼，误矣。不入院者执一以相攻更大误矣”。“非博不通，非专不精”^④，两者要兼而有之。他主张读书不要存门户之见，应取其长而学之，“不必嗜甘而忌辛也”^⑤。他还要求学生们要学以致用，关心时事。他指出“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柢。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方可切实经济。盖不读书者为俗吏，见近不见远；不知时务者为陋儒，可言不可行，即有大言正论，皆蹈唐史所讥高而不切之病。”^⑥张之洞的这些学术、教育思想对尊经书院的学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他的严格要求和历任山长的督教之下，尊经书院建立起了崇实去浮，沉静好学，钻研学术，学以致用的学风。新风气的形成为学生们提供了认真学习的良好条件。

（三）管理不同

四川各地旧式书院的管理多松懈不严，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而尊经书院制度较完备，管理严格，办事认真。尊经书院“除山长外，设襄校二人以助教，设监察二人、斋长四人以经理斋务、辅助学业（斋长以诸生之学优年长者充之）。山长综理全院行政、讲学及一切事；

山长出缺，则由襄校二人主持之。”^⑤学生都在书院内住宿，学习起居都受到院方的严格管理。在学习方面，书院形成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如规定每个学生必备日记本一册，记录每天看书起止及所得所疑。山长五日与诸生一会于讲堂，监院呈诸生学习日记予山长检阅，不认真者受罚。书院还规定学生抄书，通过抄书，一方面督促学生学习，另一方面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加深对书中内容的理解与记忆。书院还规定每月要对学生进行堂课和官课两次考试。堂课由书院主考。官课则由总督、藩司及成都府轮流主考。严格的教学行政管理和考试制度使学生不敢存有半点偷懒取巧的心理，杜绝了学生的自由散漫，加强了对学生的约束性，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四) 山长不同

四川各州县旧式书院的山长不少是志趣卑陋、虚应故事、滥竽充数者。尊经书院的山长、主讲大都是当时知名的学者。参见下表：

姓名	任山长年代	身份	备注
薛焕	1875	工部侍郎	主讲、代理山长
钱保塘	1877	候补知县	
王闾运	1878	举人	1884年再任山长
伍肇龄	1887	进士	时称“新学巨子”
刘狱云	1896		
宋育仁	1898	进士	
杜嗣兰	1902	温江教谕	

书院的山长于书院的声望和发展关系极大，故选聘山长十分重要。尊经书院之所以能声名大噪，与历任山长有很大关系，尤其是王闾运的作用突出。王闾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今文经学家。1878年底，王闾运应川督丁宝楨之邀，到成都任尊经书院山长。他上任后即针对“蜀人多务于名”的弊病，制定了“必先务于实”的教学方针，^⑥以经史、词章等实学来教育学生。王闾运“主张以教化转移风气。他认为社会不良是教育问题，而他直接负有教育的责任，所以他无处不想陶冶学生，实行师生间的共同生活，彼此敬爱。”“他任书院校长，不仅在课士，尤其语默出处之间，必使符合礼乐，笃尚廉耻，方足称移风移俗。闾运力挽颓风，以实学教诸生，以德操感士子，且以议论贬当世；所以四川学术界的空气一变而挚厚清高。”^⑦

除王闾运外，伍肇龄、宋育仁等对尊经书院的影响也很大。

三、尊经书院对四川社会的作用

尊经书院在四川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四川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四川知识界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首先，尊经书院对四川士林风气的整肃，蜀学的振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尊经书院是四川的教育中心和学术中心，对四川各地的士子起着楷模作用。由于尊经书院主张崇实去浮，认真读书，深研学问，四川士林风气为之改变，“风向所趋，人人皆知读书之有益矣”^③。“先是文襄未来时，蜀士除时文外不知读书，至毕生不知《史》《汉》。文襄以读书相号召，创立尊经书院，重浸五经四史，风气为之一变”，士子“惟心知向学”^④。“一时人文蔚起”，“蜀学勃兴矣”^⑤。尊经书院在科举八股盛行之时，独树一帜，将数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一大障碍物、汨没人才之八股摒弃，使四川知识界的思想得到解放。蜀士终以认真读书，研究学术之风由是复兴。尊经书院从创办伊始，课之以肇经，引之以读史，旁兼诸子，下逮百家，植柢词林，采源艺海，虽仅岁历三年，学生所写的诗文已逾千篇。光绪五年，书院选其中部分优秀文章刊印成《蜀秀集》，其后又陆续刊印了《尊经书院初集》、《二集》、《三集》，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形成了四川学术中心，涤荡了士林中的陈腐气息，好学之风蔚然兴起，改变了旧有的士林风貌，有力地推动了四川学术的发展。

其次，尊经书院成为培养四川人才的摇篮。

清朝中前期，四川虽文学科名仍称济济多士，但于社会、于文化的发展有贡献者寥若晨星。较著名者如费密著《宏道书》，抨击宋学。唐甄著《潜书》，为清代朴学开山者。但费、唐二人皆终老江苏，于四川社会影响甚小。至于李调元、彭端淑、张向陶虽也小有名气，但都未达到一流的学术水平。四川人才实际上落到历史上最低水平。尊经书院建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晚清最后30余年间，四川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中不仅有知名全国的大学者、大诗人，也有著名的改革者、教育家。他们不仅对四川，也对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尊经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尤多，见下表。

尊经书院部分学生表略

姓名	事 略
宋育仁	进士，甲午战前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参赞，戊戌时期是名噪京师的“新学巨子”，四川维新运动的发起人，创办《渝报》、《蜀学报》，曾任尊经书院山长，民国后任四川国学院院长。
杨 锐	举人，甲午战后创办京师蜀学会、蜀学堂，鼓吹变法，参加保国会，1898年参予“百日维新”，任四品军机章京，变法失败后牺牲，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廖 平	进士，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经学大师，曾任尊经书院山长、四川国学院院长、《蜀学报》负责人，其经学思想对康有为产生了巨大影响。
吴之英	《蜀学报》主编，著名的书法家、教育家、著作家。
骆成驥	进士，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曾任山西学政、四川大学校长。

蒲殿俊	进士，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四川谘议局议长，立宪派领袖，民国四川军政府都督，五四时期北京《晨报》主编。
张澜	进士，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曾任民盟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彭家珍	留日学生，京津同盟会负责人，为中华民国的建立而舍身炸敌，被孙中山追赠为大将军。
吴玉章	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国民党“二大”秘书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鲁迅艺术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共高级领导人。
吴虞	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时期“只手打孔家店”的先锋。
傅增湘	进士，著名教育家，创办天津女子公学、高等女校、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民国后曾任教育部教育总长。
张森楷	举人，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撰有近千卷的著作。
谢无量	著名学者、教授，全国文史馆副馆长。
顾印愚	著名书画家。

除了上表所列以外，清末民初知识界一大批著名人物如岳森、胡从简、刘子雄、刘涑原、杜翰藩、方鹤斋、黄芝、林思进、刘咸荣、徐炯、王瑞征等都曾受业于尊经书院。至于一秉师承，间接地与尊经书院发生关系者不胜枚举。尊经书院确为近代四川人才之摇篮。

第三，尊经书院成为四川传播文化思想的中心和维新运动的基地。

尊经书院建立不久，即建立了尊经阁，陆续从外省购买了大批图书典籍，“及中西时务书报、挂图、仪器、标本，均甚丰富”^④。继后又开设了尊经书局，先后刊印了百余种书籍，除经、史、小学、舆地等方面的书籍外，还刊印了部分有关时务的著作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不仅解决了清朝两百多年来四川士人读书困难的问题，而且还把新知识、新思想引进了封建思想烟瘴弥漫的四川知识界，使士人的思想和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均发生变化，从而为维新运动在四川的展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尊经书院不仅对四川产生了影响，而且也对整个中国维新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影响。尊经书院毕业的廖平在19世纪80年代，集清代今文经学家之大成。中国维新运动的倡导人康有为就是在受廖平的影响后，“尽弃其旧说”才写作了引起中国思想界地震般震动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⑤

甲午战后，维新运动在四川兴起，尊经书院又成为维新派的一个重要基地。宋育仁等人在尊经书院设立蜀学会，联络川省各地的维新志士，讲求新学，力主变法；并以蜀学会的名义创办《蜀学报》，痛陈亡国危机，宣传变法维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法律制度，“与海内时流相应合”，使四川知识界风气盛开，景象灿然。“坊间则《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校邠庐抗议》、《孔子改制考》、穆勒《名学》、赫

胥黎《天演论》诸书，自白首老儒，黄口学僮，殆无不家喻户晓。学使者发策决科，诸生试卷中或能挪用登二十世纪大舞台，不自由毋宁死等语者，并受到宏奖，猎高第以去，一时风气波荡如此。”^⑥

尊经书院从1875年创办到1902年改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其间仅28年，时间虽短，但影响却大且远。它不仅充当了扫除清朝前中期四川士林中腐败气息的清道夫，而且首开了四川近代教育之先河。它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泽教所及，全川化之”的作用，而且对以后四川新式教育的兴起，学术思想的发展，人才的产生起了十分重要的启导作用。在四川近代教育史上，尊经书院所做的历史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①⑤《成都府志》卷35，康熙二十五年刊。

②《滄溟囊》卷4。

④⑨⑩《华阳县志》卷35、卷18。民国23年刊。

⑤《清史稿》食货志。

⑦《双流县志》卷4，民国10年刊。

⑧⑭《名山县志》卷11，民国19年刊。

④⑫⑬邹容《革命军》。

⑮⑯⑰⑱张之洞《轺轩语》。

⑩《锦江书院纪略》。

⑫黄力扬《成都书院考略》。

⑬《锦江书院咸丰学规》。

⑭⑲《刘光第文集》第51页、第50页。

⑮⑯⑰⑱⑲⑳《张之洞奏议初编》。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张之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

㉜《张文襄公年谱初稿》。

㉝④徐仁甫《振兴蜀学人才辈出的尊经书院》。

⑤⑥《王闿运年谱》第89页。

⑦柳定生《四川历史》。

⑧伍肇龄《尊经书院课艺二集序》。

⑨廖宗泽《先王考府君行述》。

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 书 讯 ·

台湾出版汤炳正教授著《语言之起源》

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教授汤炳正先生《语言之起源》一书，最近由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汤先生早年受业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之门，攻治文字声韵之学。从三十年代以来，在《制音》、《论学》、《教育文学》、《中国语文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语言学论著多篇（部）。其语言学研究以对人类语言起源的考察为出发点，创立新说，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本书是其旧稿、新作中13篇论著的结集。其中《语言起源之商榷》、《古语“偏举”释例》、《原“名”》等对先民以“容态语”和“声感语”表意诸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同于语言学界传统说法的新结论；《〈说文〉“歧谈”考源》对先民“歧谈”现象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深入考察了古代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纠正了“文字是在语音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传统说法；《〈广韵订补〉叙例》、《〈法言〉汪注补正》对《广韵》勘正、《法言》训注亦多有新见；《汉代语言文字学家杨雄年谱》、《〈成韵图〉与太炎先生对音学理论的建树》对汉语言学史和声韵理论的研究均有精深论述和独到见解。本书由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为纪念汤先生80寿辰而隆重推出，这不但有助于海峡两岸的文化学术交流，也将对海外语言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

（大明）